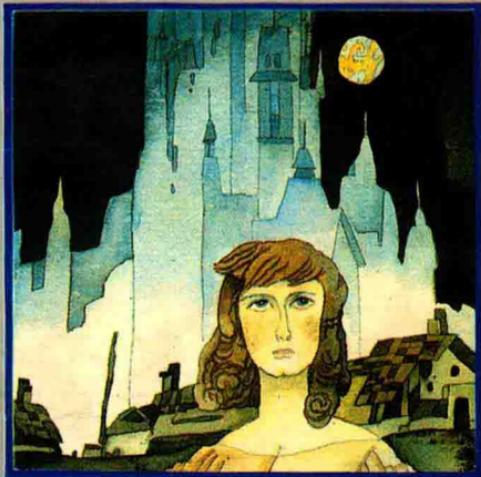


# JENNIE GERHARDT

珍妮姑娘

[美] 德萊塞著



Theodore Dreiser

浙江文藝出版社



JENNIE  
GERHARDT

# 珍妮姑娘

浙江文藝出版社

#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陈先荣 邹亮

封面画：郑凯军 钱继伟

装帧设计：靳斌 梁珊

Theodore Dreiser  
ENNIE GERHARDT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Cleveland and New York

1951

## 珍妮姑娘

〔美国〕德莱塞著 潘庆龄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杭州环城北路41号)

浙江星邦信息处理电脑有限公司照排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 插页 4 字数 370000 印数 40000—70000

1992年9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3次印刷

ISBN 7-5339-0731-0/I·680 定价：12.00元

# 第一章

一八八〇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一位中年妇女，由一个十八岁的年轻姑娘陪着，走进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一家大旅馆，来到帐房的台子跟前，打听那里有没有她能做的工作。她身子虚胖无力，面容坦率开朗，言谈举止却显得天真羞怯。她那双善于忍耐的大眼睛里，饱含着这么一点忧愁，只有满怀同情地端详过孤苦无告、心烦意乱的穷人面容的人方能理解。谁都看得出来，跟在她后面的女儿怎么会有一种羞涩、胆怯之感，使她躲缩在背后，两眼若无其事地望着别处。要知道，她母亲虽说没有受过教育，但她富有诗意的心灵里，却充满了幻想、感情，以及与生俱有的慈爱。她父亲则具有一种稳重沉着的性格，而这些性格在她身上都兼容并包了。此刻正是贫困把她们赶到这里来的。她们母女俩赤贫如洗的景况是那样富有感染力，甚至连那个帐房都被感动了。

“你乐意干什么样的工作？”他问。

“也许你们这里有一些洗洗擦擦的活儿，”她胆怯地回答。“我会擦地板。”

她的女儿一听见这句话，就怪别扭地把脸孔侧转过去，这倒不是因为她不乐意干活，而是因为她不愿让人家一眼就看出她们穷得非出来干活不可。那个帐房倒是颇有侠义心肠的，见到这样的美

人儿落了难，不免有些于心不忍。从那个女儿真的百般无奈的神情，一望可知她们的遭遇确实是苦不堪言。

“请稍等一会儿，”那个帐房说了，就走进后面办公室，去叫女茶房的领班出来。

旅馆里果然有的是工作。经常来擦地板的那个女工走了以后，大楼梯和大客厅就没有人打扫了。

“跟着她的是她的女儿吗？”女茶房的领班问，因为从她站着的地方就看得到她们。

“是的，依我看大概是吧。”

“她要是想来的话，今儿个下午就可以来。我想，那女孩子也会给她帮帮手吧？”

“你就去找女茶房的领班，”那帐房回到办公桌跟前高兴地说。“就打那儿过去，”他指着附近一道门。“她会关照你的。”

原来，吹制玻璃的工人威廉·格哈特本人和他全家屡遭不幸，以上短小的一幕，不妨可以说，就是这出悲剧的顶点。威廉·格哈特碰到的正是下层社会里司空见惯的厄运，他每天都得看着他的妻子，他的六个孩子，还有他自己，就靠哪一天赶上运气好，赐给他的一点儿东西勉强过活。他自己正病倒在床上。他的大儿子塞巴斯蒂安——他的同伴们管他叫巴斯——现在本地一家制造货车厂商那里当艺徒，每周收入只有四块钱。大女儿珍妮维芙，虽然十八岁多了，至今还没有学过任何手艺。剩下的孩子是，乔治十四岁，玛莎十二岁，威廉十岁，维罗尼加八岁，他们年纪还都太小，什么事都不会干，只是给全家生活徒增困难罢了。他们生活上唯一的依靠，就是那所房子，尽管用房子来抵押只借得了六百块钱，毕竟还是属于格哈特的财产。当时他所以要筹借这笔钱，是因为买下这所房子，已把他全部积蓄都花完了，但他还想在旁边另搭三个房间和一条门廊，这样一家人方才能住下。虽然离抵押期限还有好几年，但

因为他日子过得越来越紧，不但把平日攒下来准备还本的那一点儿钱动用了，就连偿付年息的钱也都花完了。格哈特求告无门，自己知道日子难过，——医生索取诊金的帐单，房子抵押后的按期付息，不用说，还有向肉铺子、面包房的赊欠，尽管店主们知道他的确诚实可靠，随他拖欠不还，可是到头来还是信不过他了，——以上种种烦恼沉重地压在他心上，使他寝食不安，他的病也就迟迟好不了。

格哈特太太可不是一个弱女子。她一直替人家洗衣服，反正有多少洗多少，其余的时间就得给孩子们穿衣、做饭，打发他们去上学，还要给他们缝补衣服，侍候卧病的丈夫，偶尔她也会暗自落泪。每当杂货铺不肯赊欠东西时，她又得常常亲自出去，寻找一家远一点的新杂货铺，先拿一点儿现钱开个户头，以后记帐赊欠，直到有人警告那位好心的铺子老板切莫上当、不再让她赊欠的时候，她只好越走越远，另找新的铺子去。那年月，玉米最便宜。有时她就煮上一锅加碱玉米糁，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吃上整整一个星期。玉米粉调成粥，也总比没东西吃强些，不过里面要是加上一点儿牛奶，那就算得上吃酒席了。炸土豆——在他们看来几乎就像一种佳馔，咖啡则是难得喝上的珍品。煤块是他们提着篮子、木桶，沿着附近铁路车场的岔道两旁捡来的。劈柴同样也是从附近木栈那里拾来的。他们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熬着日子，无时无刻不在巴望父亲的病好起来，玻璃厂早一点开工。无奈冬天转眼就到，格哈特开始感到绝望了。

“我恨不得马上摆脱掉窘境才好，”——这是那个倔强的德国人嘴上常说的一句口头禅，不过，他说话时那种有气无力的声音，还是表达不出他内心的焦灼不安。

真是祸不单行，偏巧小维罗尼加又出了麻疹，一连好几天，大家都认为她八成儿活不成了。她的母亲什么事都顾不上了，只是守

在她身旁，一个劲儿替她祈祷神佑。埃尔旺格大夫纯粹出于人类的同情，每天都过来给那个孩子认真诊治。路德宗教会<sup>①</sup>里的旺特牧师，也以教会的名义前来表示慰问。他们两个人都把一种阴森森的宗教气氛带到了格哈特家里。他们是身穿黑袍、由至高无上的主派来的神圣使者。格哈特太太好像以为马上就要失掉自己的孩子，忧心忡忡地守在那小床旁边。三天以后，危险好歹过去了，可家里连一块面包都没有了。塞巴斯蒂安挣来的工钱，都拿去买药了。只有煤块还可以随便去捡，可是，孩子们已有好几回从铁路车场被撵了回来。格哈特太太把她可以求职的地方通通想过了，正在绝望之中才想起了这家大旅馆。现在她真像奇迹一般，时来运转了。

“你要多少工钱？”女茶房问她。

格哈特太太没承想到人家会征求她的意见，可是她为饥寒所迫，就壮了壮胆回答说：

“一天一块钱，不算太多吧？”

“不太，”女茶房说。“这里每星期大概只有三天的活儿。你只要每天下午来一趟，就干完了。”

“好极了，”格哈特太太说。“打今天就开始？”

“好的；你跟我来，我指给你看打扫的工具在哪儿。”

她们就这样即刻被领进的地方，是当地一家以豪华著称的大旅馆。作为俄亥俄州首府的哥伦布，人口有五万，过往旅客络绎不绝，确是经营旅馆业的理想场所，事实上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大好机会，至少当地居民对此颇感得意。这家旅馆是一座气势宏伟的五层楼的建筑物，坐落在本城中央广场的一隅，广场那里则是州议会大

<sup>①</sup>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由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基督教新教教义。有时也指依据这种教义而成立的新教教会，即路德宗（亦称信义宗）的教会。最初产生于德国，后成为北欧各国的国教。18世纪随着德国移民而传入美国，后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基督教（新教）大宗派之一。

厦和各大商店。旅馆大厅很宽敞，不久前还重新装饰过。白色大理石地坪和墙裙，因为经常细心揩擦，总是闪闪发亮。富丽堂皇的楼梯两侧是胡桃木扶手，每个踏级上都嵌着黄铜横条。大厅的一隅，有一个专卖报纸和香烟的柜台，十分惹人注目。帐房间和经理部各办公室，就设在楼梯拐弯处底下，全用上等硬木板壁隔开，都安上了当时最新款式的煤气装置。站在大厅尽头的一个门口，就可以望见旅馆附设的理发厅，里面摆着一排排理发椅和刮脸用的水杯。旅馆门前经常有两三辆接送客人的汽车，按照火车开行的时刻一会儿开来，一会儿又开走。

这个大旅馆是本州政界冠盖云集之处。有好几个州长，在他们任期内都把这里当作常驻的寓所。还有两个美国参议员，只要到哥伦布来办事，少不了住到这家旅馆里带有客厅的房间。里头有一位就是参议员布兰德，差不多被旅馆老板看成是个长住的客人，因为布兰德不仅是本城居民，而且还是个单身汉，除了旅馆以外，城里已是无家可去了。在其他来去匆匆的客人里头，包括众议员、本州议员，以及院外游说的政客、商人、自由职业者，总之，各色人等，应有尽有，他们来来往往，使得这个有如万花筒一般的世界越发眼花缭乱、喧声鼎沸。

她们母女俩突然被抛入这个光艳夺目的小天地，不由得感到无限惊骇。她们总是小心翼翼的，什么东西都不敢去碰，生怕得罪人家。她们负责打扫的那个铺着红地毯的大门厅，在她们看来简直如同宫殿一样富丽堂皇；她们总是连眼睛都不敢抬起来，说话时也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后来去刷洗楼梯踏级，揩擦漂亮的楼梯上那些铜条的时候，她们俩可得要鼓起一点儿勇气来才行，因为这时母亲心里不免有些胆怯，而女儿觉得自己就这样出现在大庭广众之前，哪能不害臊呢。客人们就在楼梯下壮丽宏伟的休息厅里闲坐、抽烟，而且还不断有人进进出出，谁都看得见她们母女两个。

“这儿不是挺美吗？”珍妮维芙喃喃自语道，但一听见自己的声音，心里就感到紧张不安。

“是啊，”她母亲回答说，这时正跪在地上，用她那双笨拙的手使劲在拧揩布。

“住在这儿一定花很多的钱吧，你说是不是？”

“是啊，”她母亲说，“小小的旮旮旯旯里，可别忘了擦。看这儿，你就漏掉了。”

珍妮听了妈这么说，心里很憋气，但她还是认真地干活，使劲地揩呀擦呀，再也不敢抬头东张西望了。

母女俩就这样胼手胝足地从楼上沿着楼梯揩擦下来，一直忙活到五点钟光景。外面天黑了，整个大厅却灯火辉煌。她们眼看着快要擦到楼梯底脚了。

经过偌大的转门，一个身材颀长、气度非凡的中年绅士，从寒气袭人的户外走了进来。他头戴缎子大礼帽，身披军用大氅，在这些悠闲自在的人群里头，一望可知他是一位重要人物。他脸孔黝黑端庄，但轮廓鲜明，显出富有同情心的线条；他那闪闪发亮的眼睛上面，有两道乌茸茸的浓眉毛掩映着。他经过柜台旁边，随手捡起早就给他准备好的钥匙。走到楼梯边，他就款步登楼了。

他看见在他脚跟边擦地板的中年妇女，不但绕开她走了过去，而且还亲切地摆摆手，仿佛在说：“不必为我挪动嘛。”

可是这时，那个女儿已站了起来，跟他面面相觑了。从她那困惑不安的眼色里，可以看出她生怕自己挡住了他的去路。

他和蔼可亲地鞠了一躬，笑了一下。

“你不必感到不好意思，”他说。

珍妮只是报之以一笑。

他一走上楼梯口，情不自禁又回过来乜了一眼，这次才算看清了她那异常动人的容貌。他看到她那白白净净的高额角，一头秀发

光滑地从额前分开，扎成两支辫子。他还看见她那碧蓝的眼睛和秀丽的面容。他甚至还可以尽情欣赏她那动人的嘴唇和丰满的双颊，——特别是她那丰腴、雅致的身段，洋溢着青春、健美的气息，而且充满一种乐观的希望，这一切使中年男子顿时产生非分之想，认为最值得向造物主默祷祈求。他看了这一眼，再也没有回头张望，就不失尊严地径直往前走去，不过她那魅人的风韵，也难以忘怀地随他一块儿去了。这个人就是资历不深的参议员：可尊敬的乔治·西尔威斯特·布兰德先生。

“刚上楼的那个人，不是很漂亮吗？”过了一会儿，珍妮说。

“是呀，很漂亮，”她的母亲说。

“他还拄着一根顶端镶金的手杖呢。”

“人们打这儿走过，你可别瞪着眼睛看，”她的母亲一听就明白，就特意关照她。“这样不好。”

“我可没有瞪大眼睛看他呀，”珍妮天真地回答说。“是他自己向我鞠了一躬呢。”

“好吧，往后你千万不要去看人家，”她的母亲说。“说不定人家要反感的。”

珍妮又默默地干起活来，可是，这个奇妙世界的魅力，却使她产生了种种感想。她对她周围的兴高采烈的谈笑声和喧闹声，实在没法掩耳不听。底楼一部分是餐厅，从那里传来了杯盘碰击时的丁当声，想来正在预备晚餐了。另一部分就是大客厅，有人正在那里弹钢琴。那个地方正弥漫着晚餐前常有的那种悠闲轻松的气氛。它在这个天真的工人女儿心中勾起了一种希望，因为她毕竟年纪很轻，贫困也还不足以让她稚嫩的心灵里全都充满了忧愁。她一直很勤奋地在揩擦，有时忘了满脸愁云的母亲就在她身边。她母亲慈祥的眼睛两边布满了鱼尾细纹，而且为了日常生活发愁，嘴上老是唠叨不休。她只是在暗自琢磨：眼前的这一切都很诱人，但愿自己

也能分沾到一点儿才好呢。

到了五点半，女茶房的领班想起了她们，就来关照她们可以走了。那时楼梯总算全都擦完了，母女俩才松了一口气，离开了那里。她们拾掇好工具以后，就急忙回家去了。至少说那个母亲，一想起自己好歹有活儿可干，不用说心里怪高兴的。

一路上她们走过了好几幢漂亮的房子，珍妮心中又勾起了旅馆里新奇罕见的生活所产生的那种模糊不清的情绪。

“有钱不就很好吗？”她说。

“是啊，”她的母亲回答时，心里惦着正在闹病的维罗尼加。

“旅馆里餐厅好大，你看见了吗？”

“我看见了。”

她们路过了一些低矮的棚屋，脚底下踩着沙沙作响的枯叶。

“真巴不得咱们也有钱该多好，”珍妮几乎在自言自语地说。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的母亲长叹了一声，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事来。“我知道家里一点儿吃的东西都没有了。”

“咱们顺路再去看看鲍曼先生吧，”珍妮大声说道，母亲说话时的绝望语调，又唤起了她那天生的同情心。

“你说他还会信得过咱们吗？”

“咱们不妨跟他说明咱们已在什么地方工作了，让我去说说。”

“好吧，”她的母亲疲倦无力地说。

离她们家两个街坊有一家灯光暗淡的小杂货铺，她们忐忑不安地闯了进去。格哈特太太还没有开口，珍妮却抢先说了。

“今天晚上，劳驾赊给我们一点儿面包和咸肉行吗？我们已在哥伦布大旅馆打工。星期六准定把钱还给你。”

“是的，”格哈特太太又加了一句，“现在可有工作做了。”

格哈特一家还没有贫病交迫以前，鲍曼早就同他们有生意往来的，所以知道她们说的是实话。

“你们在那儿打工有多久了？”鲍曼问。

“今天下午才开始。”

“唉，目前我的情况，格哈特太太，”他说，“您总了解的，并不是我存心不肯。格哈特先生历来说话是算数的，偏偏我自己手头也很紧。日子可真难过呢。”他又加上一句，“我自个儿也得养家糊口呀。”

“是呀，我都知道，”格哈特太太有气无力地说。

她的那双干了一天活儿的粗手已经红肿了，虽然用她那条破旧的蹩脚围巾遮盖着，但还是在里面局促不安地颤动。珍妮站在一旁，默不作声，显得挺尴尬。

“好吧，”最后鲍曼先生说，“我想就再赊一回，下不为例。星期六您务必归还我。”

说完，他就把面包和咸肉包扎好，递给了珍妮，冷言冷语地又加了一句：

“我说，你们一有了钱，大概就去照顾别处的生意啦。”

“不会的，”格哈特太太回答说，“这您可了解得最清楚都没有了。”不过，她心里太激动，不敢再辩白了。

她们出了杂货铺，踏上那条黯淡无光的街道，经过了好几家矮棚屋，向自己家走去。

“我真不知道，”快要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格哈特太太疲惫不堪地说，“他们捡到了煤块没有。”

“你别着急，”珍妮说。“要是他们没有捡回来，我会去捡的。”

“嘿，有一个家伙撵我们呢，”母亲一问到捡煤块的事，心慌意乱的乔治还来不及向她问一声好，就脱口说道。“反正我总算捡到一点儿，”他又说了一句。“我这是从一个车皮上扔下来的。”

格哈特太太只是淡淡一笑，珍妮却大声笑了。

“维罗尼加怎么样了？”她问。

“她好像睡着了，”父亲说。“五点钟我又给她吃过药。”

一顿分量少得可怜的晚饭还在准备的时候，母亲就走到病孩床边，又照例开始陪夜了。

吃晚饭的时候，塞巴斯蒂安出了一个主意，因为他的社会经验和经商经验比较丰富，所以他提出的意见就值得好好考虑了。他虽然只是客车修造厂里的一个艺徒，从来没有受过正式教育，除了他自己竭力反对过的路德宗教义以外，他就一无所知了，——可是现在，他身上却充满美国人的色彩和活力了。他改称巴斯这个名字，确实跟他十分般配。他长得身材魁梧，孔武有力，按他的年龄来说，可以说相貌堂堂，是一个典型的城市青年。他早就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学，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有所作为，——必须去结交这个最最讲究体面的社会上那些阔佬大亨——或者至少也要佯装是在跟他们交往的样子来。

基于上述原因，这个年轻小伙子总喜欢到哥伦布大旅馆附近去转悠。他觉得这家大旅馆就是当今社会上所有要人麇集的中心。如今他能挣钱、买得起一套体面衣服，每天晚上就去闹市区，跟他的那一拨朋友站在旅馆门前闲荡，嘴里叼着五分钱可买两支的雪茄烟，炫耀自己身上的时髦装束，两眼盯住年轻女人。有时也有一些小伙子跟他在一起的，他们就是城里的花花公子、纨绔子弟，还有特意上那儿去刮脸或喝一杯威士忌的年轻人。所有这些人——他都暗自羡慕，一心想要胜过他们。看人首先看衣着。人们只要身上穿着好衣服，戴着戒指和别针，那末，不管他们干出什么事来，似乎都是无可厚非的。巴斯就是要做这样的人，一举一动都仿效他们。因此，他对那种无聊透顶的闲荡生活早就见多识广了。

“你们干吗不向旅馆里的客人要一些衣服来洗洗？”珍妮一说完那天下午的经过情况，巴斯就这样问她。“这个总比擦洗楼梯好些。”

“你说说怎么个要法呢？”她反问了一句。

“当然，要去问那个帐房呗。”

珍妮觉得巴斯这个主意非常高明。

“要是你在那儿碰上我，可别跟我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又在背地里关照她说。“你别露出认得我的样子来。”

“为什么呢？”珍妮天真地问。

“嘿，你是知道为什么的，”他回答说，原来巴斯早就有言在先，像她们这么一副穷酸相，要是把她们认做亲骨肉，还不是叫自己丢脸吗。“你只假装没看见就得了。听见了吗？”

“好吧，”珍妮百依百顺地回答，论年龄，他虽然比她只大一岁，但毕竟是兄长，珍妮还得听他的话。

转天，珍妮在去旅馆的路上，把巴斯这个主意告诉了母亲。

“巴斯说咱们不妨向旅馆里客人要一些衣服来洗洗。”

这个主意格哈特太太马上就赞成了，因为除了她六个半天可得三块钱以外，能否再挣一些钱这个问题，她已经尽脑汁想了整整一夜。

“那敢情好！”她说。“我就去问帐房。”

可是，她们到了旅馆以后，一时还没有机会去问这事。她们一直忙活到傍晚，也算是碰巧，女茶房的领班叫她们去擦帐房间后面的地板。那位帐房对待她们母女俩非常和气。他喜欢那个母亲淡淡的愁容，也喜欢那个女儿秀气的面孔。所以，他就和颜悦色地听着格哈特太太怯生生地而又冒昧地把整个下午萦回心头的那个问题提出来了。

“请问这儿有哪一位先生，”她说，“乐意把他的衣服交给我洗吗？那我可要感激不尽呢。”

帐房看了她一眼，从她焦急的脸上又一次看到她走投无路的神色。

“让我想想看，”他回答时就想起了参议员布兰德和霍普金斯将军。他们两位都是好心肠，非常乐于帮助一个穷苦的女人的。“你就上楼找参议员布兰德去吧，”他继续说。“他住在二十二号，”他写下了房间号码，又说了一句，“拿着这个硬卡，你就上楼，说是我叫你去的。”

格哈特太太抖抖索索地把硬卡接了过来，眼里充满了她难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感激之情。

“就这么办，得了，”帐房看到她激动的神情，就说。“你这就上楼去。他正在房间里。”

格哈特太太满怀着最大的羞怯心情，轻轻地去敲二十二号房间的门。珍妮默默地站在她身边。

过了一会儿，房门开了。房间里灯光辉煌，耀人眼目，那位参议员正伫立在那里，身上穿着一件漂亮的吸烟衫，看上去比她们头一次见面时更年轻了。

“您好，太太，”他说，他认出了她们母女两人，特别是那个女儿。“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呀？”

珍妮的母亲感到非常羞愧，迟疑了一下才回话。

“我们想问问，也许您有什么衣服可以交给我们洗洗吧？”

“要洗衣服？”他仿照她的回答又重复说了一遍，他说话时的声音听起来特别响亮。“要洗衣服？请进来吧。让我想想看。”

布兰德落落大方地闪在一旁，摆摆手叫她们进去，把门关上。“让我想想看，”他又重复说了一遍，随手把黑桃木大衣柜里的抽屉一个个地都打开，又给关上。珍妮津津有味地仔细观察那个房间，摆在壁炉架上和梳妆台上那么多玲珑剔透的小玩意儿，她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参议员的安乐椅旁边，有一盏绿罩的灯，一大块华丽的厚地毯，还有好几块精美的小地毯，——这是何等闲适，何等富丽啊！

“坐下，就在那儿两把椅子上坐吧，”参议员和蔼可亲地说着，就向一个壁橱走去。

母女俩依然诚惶诚恐，觉得还是站着不坐，反而更有礼貌，可是，这时参议员刚好找过东西，又一次请她们坐下。她们俩神色惶遽地不得不从命，这才落了座。

“这是你的女儿吗？”他朝着珍妮微微一笑，继续问道。

“是的，先生，”母亲回答说。“她是我的大闺女。”

“你丈夫还健在吗？”

“他叫什么名字？”

“他住在哪儿？”

对于以上所有问题，格哈特太太都必恭必敬地回答了。

“你有几个孩子？”他继续问。

“有六个，”格哈特太太说。

“哦，你家人口真不少呀，”他回答说。“不用说，你对国家算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是的，先生，”格哈特太太回答说。她已被他那殷切关注的态度所感动了。

“你说这是你的大闺女？”

“是的，先生。”

“你丈夫干哪一行的？”

“他是个吹制玻璃的工人。可是现在，他病倒了。”

他们正在一问一答的时候，珍妮那双碧蓝的大眼睛始终饶有兴趣地睁大着。参议员看她一眼，她就天真坦率地向他投以一瞥，或者茫然不知所措地报之以一笑，以致他的目光几乎一刻儿都离不开她了。

“是啊，”他满怀同情地接下去说，“那真是太糟了！我这儿有一些衣服要洗的——不太——可是欢迎你们拿去洗。下星期也许

还有呢。”

他一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面把衣服塞进一个饰有花边的蓝布袋里。

“这些衣服您哪一天要？”格哈特太太问。

“不，”他捉摸了一下说，“下星期内哪天都行。”

她只向他说了一句道谢的话，就起身走了。

“让我想想看，”他说着，抢前一步，开了门，“你不妨在下星期一送回来。”

“好吧，先生，”格哈特太太说。“谢谢您。”

她们走了，参议员又看起书来了，可是不知怎的，心里很不平静了。

“糟透了，”他掩卷沉思道。“这些人的遭遇真够可怜的。”珍妮在惊羡赞赏时的那种神态，又在客房里重现了。

格哈特太太和珍妮又沿着幽暗的街道走去。她们好像突然走运了，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兴奋。

“他那个房间很漂亮吧？”珍妮低声说。

“是啊，”母亲回答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呢。”

“他是一个参议员，是不是？”女儿接着问。

“是的。”

“做一个大名人，我想一定是够美的。”女儿悄悄地说。